

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研究

□ Oded Shenkar^①

摘 要：在中国，关于组织问题的研究具有上千年的历史，同时它也是世界上运作时间最长的官僚系统。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管理的研究兴趣日益增多，然而，这更多的是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而并不是因为研究中国能够为学术概念和理论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我在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上是一个“向内窥探的外来者”（an outsider looking in），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首先回顾有关中国管理研究的演进过程，这方面的研究一开始仅仅是源于好奇，目前已经具有了合法性；然而关于中国的研究目前仍遭遇到需要套用现有理论与方法的尴尬。本文认为普适主义和本土化研究的模式均不可取，而是应该遵循一种混合型的研究模式（a hybrid approach），即中国管理研究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独特性，从这种独特性出发，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发展情景化的组织理论和管理模式。

关键词：中国管理；本土研究；学术普适主义

一、引言：我的学术旅程

由于每个人的教育背景不同，人生经历也不尽相同，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都有可能存在个人的偏见。因此，为了向读者阐明我观察中国的视角，有必要交代一下我的个人背景，这也是文化研究学者（我也视自己为其中一分子）的通行做法。经常有人问我，我是如何在大多数西方人对这个国家不感兴趣的时候就开始迷上中国的？我想这与一种渴望有关，就是那种想一探究竟的渴望；那时的中国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黑洞”，未知而又神秘诱人。我于 1972 年进入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① 俄亥俄州立大学费舍尔商学院、中国研究所，福特汽车公司全球商务管理讲座教授、管理学与人力资源教授。

Jerusalem) 中国和日本研究系(后改名为东亚研究系)学习。那时的中国对我来说是这样一个国家:有着辉煌过去、暗淡现在和阴云密布的未来。所以,当时学校要求我们选修双专业(double major),因为学校认为这个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当时我选择了社会学作为我的第二专业,因为我认为社会学是我对中国和中国组织的研究兴趣的一个良好补充。由于当时在以色列没有研究中国的研究生课程,毕业后,我在希伯来大学继续攻读社会学硕士,专注于组织研究,同时也学习商学院的课程。与此同时,我开始在杜鲁门研究所工作,在那里我有幸与现在已故的 SN Eisenstadt 合作,学习比较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直到今天还为我所用。

完成硕士学习后,是继续攻读社会学、工商管理还是攻读中国研究的博士学位?我的思想上有过激烈的斗争。最后我决定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当时,关于组织的严谨研究主要产生于社会学系,而非商学院;而所谓的中国研究系或研究所虽然对于中国这个国家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却缺乏关于管理方面的深入研究,不过,中国于我而言仍然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于是我向学校申请资格考试,专注于中国社会学,并获得批准。这是哥伦比亚大学首次有学生在资格考试中以此为题。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以中国的官僚机构为题,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则来自社会学、东亚研究所和商学院。在此过程中,我很快意识到跨学科研究很有前途,但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尽管我的导师们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当时也有人认为非本领域的学者很难对研究课题做出指导。然

而,我从中认识到运用多视角来探索同一现象的价值。这于我而言是一种顿悟,对于我的学术生涯也大有裨益。可惜,主流学术刊物仍然局限于单一学科学术成果的发表,因此,多视角研究也常常成为我在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一块绊脚石。

在我的想象中,学术生活是充实并富有回报的。然而,博士一毕业,我发现这一想象并不现实。我毕业于1981年,当时,社会学系正成为濒危物种,而商学院却蓬勃发展,然而,有关中国的研究却没有受到商学院的重视。那时,与世隔绝的中国只占全球GDP的3%。而且,尽管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但当时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有一天会成为经济上的重量级选手。最终,我获得了大学教职。然而,我提交的凡是与中国相关的论文几乎都是未经评审就被退了回来,通常论文编辑会回信表示歉意,指出我所提交的文章和其所编辑的期刊毫不相关,我的文章也许可以在区域研究类期刊上发表。但不幸的是,在商学院,“不发表即出局”,而把文章发表在区域类期刊上在商学院根本不值一提。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把 *China Quarterly* (关于中国研究的顶级期刊) 发文对我的关于中国管理的著作进行书评这一好消息与我们的院长分享时,院长仅仅是打发性地回应了我。没有办法,为了生存,我尝试将自己的研究扩展到其他领域,这一转向后来被证明是有价值的,我由此拓展了我的技能和视野,同时也能够将中国放在更为广泛的背景下进行研究。

然而,中国依然在向我招手。因此,1987~1988年,我没有理会我的导师提出的在美国休

学术假的建议，而是选择了去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到那以后，我得以有机会前往中国内地，访问大学、政府机构和企业。自此以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前往中国。在被美国和以色列的大学联合聘任了几年之后，我最终定居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担任俄亥俄州立大学费舍尔商学院第一个以福特汽车公司冠名的全球商务管理讲席教授和管理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系教授；我同时也是该校亚洲研究中心和中国研究所的成员。

二、“中国管理”：一个概念的演变

1987 年，当我首次在夏威夷大学教授关于中国管理的课程时，我甚至不太清楚中国管理到底是什么。当时，中国仍然不被西方管理学者所关注；即使有学者关注，他们更多地也只是出于好奇，将中国视为异类甚至是怪物。然而，在现实的新兴商业机会的驱动下，实践者对中国的兴趣却开始显现。我记得我曾经在课堂上邀请过一家美国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当时，该公司正在中国成立第一家合资企业，并试图在学生中寻找潜在的外派员工。然而，从学术角度来看，我不清楚关于中国管理的课程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比如，课程是关于中国人如何管理呢，还是要像当时流行的比较美国管理和日本管理的课程那样，来比较美国和中国的管理体系呢？当时，日本是美国管理学者和实践者的乌托邦，畅销书倡导美国应部分或全盘采用古老的日本管理模式。然而，当时在美国，没有人会认为（现在依然如此）他们应该效仿中国的管理模式。另外，课程重点应该

放在美国跨国公司刚刚开始进行的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吗？这一点美国的跨国公司经理可能会非常喜欢。或者，课程是否应该更多地向学生展示在不同情境下管理需要做适当改变？在缺少模板的情况下，我的课程可能是上述所有东西的大杂烩，然而我最感兴趣的始终是最后一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一问题刚好能够结合我的两个研究兴趣：中国；更为广泛的组织与管理。

显然，我盲目探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当时我没有太多的资料可以参考。在 20 世纪下半叶早期，当现代管理学日趋成熟之时，中国和其他大多非美国的国家在该领域几乎无关紧要；整个领域，无论是关于公司治理还是组织结构的研究，都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文化、历史、经济、企业演进及其困境之中。当然，这些研究都不会直接挑明其研究背景是美国；除了马克斯·韦伯及少数学者的著作之外，几乎所有的组织行为和管理学经典著作都宣称其研究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和“组织”。然而，实际上这些著作研究的更多的是美国的“人”和“组织”。韦伯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比较研究学者，其对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文明均有广泛著述。然而，在教授韦伯的著作和思想时，我们也发现虽然中国是历史上一个主要的文明古国，其在韦伯的研究中却根本没有被提及。事实上管理模式在不同国家存在很大差异，然而韦伯通过对当时存在的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却提出了所谓具有普适性的模式，比如官僚组织，这些模式后来被广泛推崇。如此一来，在美国教授韦伯的著作时，我们往往做此解读；在其他国家，亦是如此。

令人遗憾的是，几十年后，尽管经历了全球化，情况大抵还是如此。虽然其他国家的影响逐渐扩大，但美国几乎仍然是所有管理理论的来源和实地研究的主要地点。虽然期刊也发表少量比较研究，然而在这些研究中，美国仍然是恒定不变的主要参照物。换句话说，如果研究的是除美国之外的国家，它更多的是被选择来与美国形成对比（下文中我将说明该类研究将使中国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借用一句政治术语：美国在某种意义上是该领域的“核心国家”。因此，大多数人可能很少注意到，我们写作的对象一直以来都是掌舵美国公司的高管。同时，虽然我们一再强调我们的研究要有实践意义，但是整个研究领域其实大都承认了我们的研究与现实脱节，因此，可以更准确地说，我们是将美国作为写作对象的研究者。

商学院其他专业，如金融、运营、会计、营销或物流，情况也大体如此；在应用社会科学领域，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这种情况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当研究中涉及其他国家时，这些研究仍然需要将这些国家与美国进行对比，看看其与美国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如今，把与美国存在不同之处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往往更受欢迎。然而，以往的情况并非如此，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即使一个西方学者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罕有的兴趣，中国也绝不会是一个可能的选择。由于政治、文化和语言的障碍比比皆是，研究者很难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而就中国学者而言，他们也刚刚开始和世界其他地区重新建立联系。综合起来的结果就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几乎没有出现在管理文献中，这种状况即使是在最有可能

进行此类研究的领域，如国际商务中也是如此。在对该领域的重要期刊《国际商务研究》（*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上发表的文章进行回顾时，Thomas 等（1994）发现，1970 年至 1977 年间，关于中国的论文只有 1 篇，占该期刊发表文章总数的不到 1%；在 1978 年至 1985 年间，关于中国的论文增加到 2 篇，仍然不到总数的 1%；只有在 1986 年至 1993 年间，当中国开始崛起成为全球重要的出口国和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地时，这一数字才增加到 9 篇，仍然只有不到总数的 4%。1970 年至 1993 年间，没有任何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作者在該期刊发表文章，而在最后两个阶段（1978 ~ 1993 年），有两个来自中国香港地区和三个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作者在該期刊发表论文。*Management Internatoinal Review* 的情况大致相同，而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在更名为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之后情况稍微好一点（Thomas et al. , 1994）。

在快速发展了几十年之后，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研究对象之一，这符合 Thomas 等（1994）的预测。Thomas 等（1994）认为，对某个国家的研究能否出现在《国际商务研究》上，其决定性影响因素是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然而在《国际商务研究》上发表文章的作者来源发生了相当惊人的变化。2016 年，Cantwell 等（2016）回顾了 1972 年至 2014 年间在《国际商务研究》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发现 1995 ~ 2004 年有不少于 77 位来自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作者（未合并统计中国台湾地区的作者，如果统计完整，总数将增加 10 名作者），合计约为该期刊发表文章总数的 10%；而 2005 年至

2014 年间, 该比例大致相同。目前在中国, 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日益成为获取教职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 中国海归作者 (大多接受西方教育) 的数量也处于领先地位。根据 Cantwell 等 (2016) 的统计, 1972 年至 2014 年间有 57 位中国海归作者在《国际商务研究》上发表文章; 在关于海外高校任职的作者数量排行上, 来自中国的学者也排名首位, 这些作者大多任职于美国与欧洲; 这些学者一直致力于“将中国搬到地图上”, 提高中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地位, 毫无疑问这极大地增加了我们对于中国管理的知识, 但这也需要付出一定代价。

海外教育教会了海归学者以及留在西方任职的中国学者如何更广泛地与研究界交流,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同时他们开始通过有色眼镜来观察世界, 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对此, 我持有一个可能具有争议的观点, 那就是: 关于中国的研究, 或者关于任何国家的研究, 本来有机会为管理学经典提供新的知识; 然而, 从本质上来看, 这些已发表的看似令人鼓舞的研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管理学, 这些研究并没有改变我们看待管理现象的方式, 也没有改变它背后的概念和假设。我们现在的确已经有了“在中国的管理”, 即管理理论或知识可以在中国运用, 甚至检验, 但我们仍然缺乏针对解决中国国内特有的管理问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 而用关于中国的研究去解决世界范围的管理问题更是不太可能; 更为糟糕的是, 这种情况正在变得更差而不是更好, 虽然这并不是中国本身造成的。

除了接受海外教育之外, 造成目前的状况还有其他几个原因; 美国、欧洲以及越来越多

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商学院博士项目, 本质上已经或正在趋同, 彼此之间互相模仿。学校所教授的, 研究者所研究的对象都是所谓的普适性的原理, 然而事实上这些原理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被检验, 更不用说被证实; 同时, 这些原理在特定的商业环境中根本就不能运用。中国大学的博士项目 (至少在名牌大学) 也不例外, 这些大学的商学院为了摆脱其旧有身份, 正在热切地寻求国际认证。在一项有关中国商学院所采用的教学案例的重要研究中, Liang 和 Lin (2008) 报告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即越来越多的中国案例放弃了案例中的中国特色, 使得中国案例与西方案例研究毫无区别。文章作者指出, “全局管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 在中国早期 MBA 案例中也经常出现, 但是在现在的案例中却消失殆尽, 目前中国案例暴露出很多与哈佛商学院案例所具有的类似的弱点和缺陷” (Liang & Lin, 2008)。例如, 商业交往中所隐含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以及中国所特有的社会制度在案例中已不被提及, 案例中更多的是关于“理性”决策和战略“思维”的内容; 换句话说, 这种案例虽然以中国作为背景, 然而案例的展现、讨论和分析的方式却一点也体现不出中国的特色。

三、中国例外论

“例外论” (exceptionalism) 一词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科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中, 主要用来表明美国有别于所有其他国家, 具有独特的历史进程。这类研究认为最终所有国家都将走上美国的道路, 或者美国是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

(light upon the nations)。将这一逻辑应用到我们的主题，中国例外论则意味着，由于中国具有独特的生态条件以及其连续经历了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统治，中国衍生出一种特殊文化和“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这些特殊之处，如同其独特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一样，可能可以被模仿，但是不能够被完全复制。如果接受这个前提（对于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都是如此），那么对于本土管理知识（特别是理论基础）的呼吁就无可争议了。但是，如果中国管理能够纳入现有理论、模式和框架内，即使存在个别特殊现象，那么中国管理也仅仅是现有管理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一个应用。毫无疑问，后面这种观点是管理领域中普遍盛行的观点，这种观点真的经过了检验吗？答案是否定的。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虽然这篇论文主要谈论中国，但我的观点并不只是关于中国。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看，未能从正确的视角来研究情境，不仅会导致研究缺乏有效性，而且会失去理解情境变量发挥作用的研究机会。比如，如果我们像哈佛案例一样忽略制度的存在 (Chetkovich & Kirp, 2001)，那么我们就会错过分析和理解制度发挥作用的机会；而如果我们仅按 Douglas North (1995) 所提倡的理论来理解制度，那么我们就会忽略经济制度所嵌入的文化和其他“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如果你仅仅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做研究，那么你的研究将建立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最为孤立的学科基础之上 (Fourcade et al., 2014)，这也意味着你将错失利用十分重要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科学的理论视角来理解世界的机会；如果你从美国的观点出发，那么你很有可能认为中国的产

权保护不力、制度薄弱，这样一来，你在研究中就很容易忽视这些制度实际上在当地经济发展中一直以来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这种制度的影响力正在向全球扩散。

诚然，这种关于中国制度的通行观点目前已经受到了挑战 (Nee, 1992; Boisot & Child, 1988)，但读者往往忽视了这些挑战者自身的研究也存在缺陷。例如，Nee (1992) 关于中国改革的论文被大量引用，该文标题中包含“混合”经济 (mixed economy) 一词，然而确切地说，该国经济究竟混合了什么？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中国那时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混合体；但这些真的是中国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吗？事实上，在 Nee (1992) 之后，很少有文献从理论和概念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Boisot 和 Child (1996) 可能算是一个例外。顺便提一下，Boisot 和 Child (1996) 创造了“网络资本主义”这一术语，这一术语是主流管理文献中出现的仅有的三个中国本土概念之一。然而这一研究同样存在问题，即“资本主义”和“网络”在中国情境中是否和在它们一开始被提出来的情境中具有同样的含义和作用？换句话说，我们是否真的需要一个通用的概念？或者我们只是为了方便起见，而将不同的事物组合到了一起？如果我们不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就很难深入理解它们在中国管理中是如何运作的，更进一步来说，我们放弃了理解制度差异的机会，同时我们也放弃了找出其他情境变量的机会，这也造成我们很难深入理解制度以及其他情境变量和管理现象之间的互动机制。

四、组织理论相对性

在学术圈，所有接受“要么发表，要么出局”这一观点的学者都知道，发展理论是所谓 A 类期刊的“圣杯”，而在 A 类期刊上发表文章能够为学者在研究型机构内获取成功铺平道路；然而，只有少数学者会停下来质疑，我们使用的理论是不是真正具有普适性？还是说这些理论本身就是存有偏见的？目前似乎唯一关注这一问题的群体是跨文化研究学者，然而正如其身份所暗示的，他们研究的是文化的作用，而不是其他情境变量的作用。此外，绝大多数跨文化学者主要从微观与行为层面，而不是从宏观或组织层面来做研究；而在宏观或组织层面的研究中，研究对象主要是制度，文化的差距往往被简化为“文化距离”的计算公式。然而，理论不仅仅是“要么发表，要么出局”——理论是指导我们研究的最基本的感知、假设和想法，如果它们不是具有普适性的，那么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原点，并思考我们究竟要如何研究管理现象。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这些理论是不是具有普适性，我们目前有很多研究是把西方建立起来的理论运用到其他国家，但是这些研究更多的只是基于实证结果对这些理论的所谓“有效性”所做的粗略检验；然而，这些实证结果在不同的情境下所代表的含义在实际中可能并不相同。

在提出这些质疑或者文化相对论观点的研究中（Hofstede, 1993），大部分都是基于事件观察，系统性的分析仍然非常少见。Hofstede (1996) 的文章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企图找出经济

和组织理论的根源以及背后的假设的研究之一，然而，该研究的作者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自己的敏锐观察力，因而也没有找出系统性的差异；该研究也没有进一步发展出情景化的理论，未能成为现有理论设定边界条件。

上述情况非常令人意外，管理领域中运用的所有理论几乎都源于西方（主要源自美国），你可能会认为管理是完全具有普适性的。然而，事实上我们不仅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而且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事实是完全相反的。如果你接受差异性的观点，认为就像每一个公司都因其历史轨迹不同而具有独特文化一样，每一个理论都有其特有的文化和制度背景；这样一来，你自然会质疑某一个情境中发展出来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情境，例如，除了少数研究之外，大部分研究都认为美国拥有地球上最具个人主义的文化。

那么在另一个国家情境中，运用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动机理论是否合适呢？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某一个理论被运用到针对某一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当中，并不意味着这个理论在这个国家就具有有效性。例如 Trieman (1977) 根据不同国家各类职业声望排名大体相同，推断出职业声望在世界各国都受社会分工影响，然而该研究却没有意识到，在许多国家中，职业并不是声望的关键指标。事实上，只有少数学者认为有必要针对这类研究进行纠正。比如 Adler 等 (1989) 的研究表明在中国运用西方所开发出来的量表，得出的结果毫无可用之处。从这篇文章开始，我们偶尔会看到有些研究对象量表的效度给予更多的关注，然而，更为根本的问题是这些理论是否适合被运用到其他国家。

这类问题很少被提及，更不必说被解答。例如，鉴于中国人更注重与自己的上司建立良好关系，那么目前流行的注重与下属建立关系的领导力模型还适合、还有意义吗？考虑到目前美国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先从历史的、社会的和哲学的角度（Hsu, 1981）来考察中国人和美国人究竟存在什么差异，并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其对管理有何影响？

五、“中国例外论”和 “本土”管理学

上面讨论引出了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即“中国例外论”的表现形式及其影响。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是例外的，那么在哪些方面例外？国家文化，政治、社会和/或非正式的制度，其他情境因素，或者是上述因素的综合？此外，我们可以根据现有框架（例如现存的文化分类）来评估中国吗？或者它是如此独特，以至于现有的研究根本毫无意义，因为这些研究大多植根于其他情境，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被排除在现有的知识体系之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定位中国在现有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呢？必须要注意的是，除了其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不断上升之外，最终使西方管理学界对中国感兴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该国与管理学研究的主要国家——美国在诸如文化方面等关键变量上存在截然不同之处（Oyserman et al., 200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类对比研究往往再次展现了研究中存在的美国民族中心主义，针对中国的研究往往考察的是其与美国的不同之处，或者是其与美国在某

些关键变量上存在的距离。换句话说，聚焦于中国的研究目前已经获得了合法性，但其合法性更多地来自其为主流研究提供了一面镜子，用来做比较或对照；然而很显然这类研究并没有达到与主流研究并驾齐驱的地步，更不用说替代主流研究了。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也有其自己的偏见。“中国”视自己为“中央之国”（The Middle Country）；这一点与西方长期以来称中国所在的区域为“远东”（Far East）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大家都有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世界的倾向，因此，本文的建议并不是我们要从以美国为中心转向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研究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从而使得我们能够找出现有研究中缺失的、被误解的或者是根本还没有被理解的情境因素。通过这类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研究各类情境因素，而不是使用一些太过抽象的概念，比如“动荡性”（turbulence）或者“动态性”（dynamism），从而为主流研究做出贡献。换句话说，中国研究的目标是“把中国带向世界”。

六、从中国到世界

假定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在中国运用现有管理学知识”，而且要“从中国学习新的管理学知识”，那么我们就要将中国的概念推向全世界。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中国管理的研究现状如何，目前看起来，我们并没有任何可以值得乐观之处。Jia 等（2011）经过大量的文献回顾，发现仅有三个中国本土概念进入到西方管

理学知识体系：“市场转型”、“网络资本主义”和“关系”。在这三个概念中，“市场转型”不一定是中国特有的概念（“转型经济体”所包含的国家也存在很多不同之处）；“网络资本主义”是东欧和中欧等其他原共产主义国家所共有的特征；而“关系”是唯一保留其中文名称的概念——这意味着它在其他情境中并没有相同的概念（尽管这一点目前也受到了挑战）。这篇研究因而展示了所谓“本土化研究”的局限性（Li & Leung, 2012; Chen & Luo, 2012），尽管有学者指出中国哲学中丰富的知识宝藏是本土化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源泉，但是这类研究有多常见呢？Michael Bond 和 华夏文化协会（The Chinese Cultural Connection）（1988，部分和 Geert Hofstede 合作）提出了“儒家动力”（Confucian Dynamism），后来为了强调其普适性被改称为“长期导向”（Long Term Orientation）。然而 30 年过去了，这一概念仍然是中国本土概念被主流研究接受的罕见实例；同时，这一概念也存在不足之处，其不能解释儒家与其他哲学思想（如墨家、道家和法家）为什么存在互通之处。另外，儒家思想本身也在不断演变（如孟子和新儒家）。

本土化管理研究减少了研究的可对比性，同时也降低了其对外部世界的贡献，与此同时，我们前面也提到，普适性的研究也受到了很大挑战；既然本土化研究和普适性研究都不是中国管理研究未来发展的出路，那么中国管理研究应该走一条混合的道路（a hybrid approach）。如此一来，管理学研究应该充分利用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有关的情境来提炼情境变量，进而最终形成一个可以运用到全球范围的综合

理论框架。目前，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整个管理学领域本身。在管理学领域，目前战略已成长为一个主流研究领域，然而战略研究要么完全忽略了情境因素的影响，要么将情景因素过于简化，以至于这类研究完全没有应用价值；这一类的问题目前已经扩散到其他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商务领域，在国际商务研究中，2 乘 2 的表格屡见不鲜。如果中国要想为管理学领域做出长远的贡献，从一开始我们就需要提醒自己过于简洁化（extreme parsimony）的研究是非常危险的。

为了避免过度简洁，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独特性”这一概念；不仅需要考虑其直接含义，也需要考虑其研究后果。除非能够很好地利用独特性，否则声称一个国家具有独特性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中国具有历史悠久的文明，经历了数次重大变化，这些都为我们研究管理学领域的关键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机会。例如，在文化研究领域，文化的稳定和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问题，而 McClelland（1963）则通过研究清朝、民国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儿童文学来测量文化的潜在变化；我的博士学位论文（Shenkar, 1981）研究的是中国官僚体系是如何调整以适应在清朝、民国和共产主义时期意识形态和任务上的变化的。这类研究响应了美国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关于管理学需要更多纵向研究的呼吁，尽管这种呼吁长期以来都是徒劳的。中国历史悠久，并且保留了很多历史文献，这使得中国最为适合进行此类历史研究。为了看到更多的此类研究，期刊主编也需要了解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从而不会因为研究“不具有时效性”而直接拒稿。

同样,以比较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也是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角度,但是该类研究需要审慎思考我们究竟应该拿哪一个国家来作为对比;由于美国在管理学期刊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它也与中国在多个方面几乎完全相反,我们可能会觉得继续比较美国和中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也未必如此。事实上,中国研究的一个很大优势在于目前存在多个华人社会(如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Shenkar & Ronen, 1987)。因此,对这几个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属于比较“部分类似案例”(partially similar cases)(Przeworski & Teune, 1970),能够更好地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

(接受编辑: Haiyang Li, 李新春

翻译: 李炜文; 校对: 秦昕

收稿日期: 2017 年 1 月 26 日

接受日期: 2017 年 2 月 28 日)

参考文献

- [1] Adler, N. J. R., Cambell, N., & Laurent, A. 1989. In search of appropriate methodology: From outsid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ooking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70 (1), 61 - 79.
- [2] Boisot, M., & Child, J. 1988. The iron law of fiefs: Bureaucratic failure and the problem of governance in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3 (4), 507 - 527.
- [3] Boisot, M., & Child, J. 1996. From fiefs to clans to network capitalism: Explaining China's emerging economic orde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1 (4), 600 - 628.
- [4] Cantwell, J., Piepenbrink, A., Shuklla, P., & Vo, A. 2016.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JIBS authorship.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7 (7), 749 - 777.
- [5] Chetkovich, C., & Kirp, D. 2001. Cases and controversies: How novitiates are trained to be masters of the public policy universe.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20 (2), 283 - 314.
- [6] 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 1987. Chinese values and the search for culture - free diensions of culture. *Journal of Cross - Cultural Psychology*, 18 (2), 143 - 164.
- [7] Fourcade, M., Ollion, E., & Algan, Y. 2014. *The superiority of economists*. MaxPo Discussion Paper 14/3.
- [8] Hofstede, G. 1993. Cultural constraints in management theor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 81 - 94.
- [9] Hofstede, G. 1996. An American in Paris: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ity on organization theories. *Organization Studies*, 17 (3), 525 - 537.
- [10] Hsu, F. L. K. 1981 (1953). *Americans & Chinese: Passage to differences*.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11] Jia, L., You, S., & Du, Y. 2011. Chinese context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8 (1), 173 - 209.
- [12] Li, P. P., Leung, K., Chen, C. C., & Luo, J. D. 2012. Indigenous research on Chinese management: What and how.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8 (1), 7 - 24.
- [13] Liang, N., & Lin, S. 2008. Erroneous learning from the West? A nar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MBA cases published in 1992, 1999, and 2003.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5, 603 - 638.

- [14] McClelland, D. 1963. Motivational patterns in Southeast As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hinese case. *Social Issues*, 19, 6 – 19.
- [15] Nee, V. 1992.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market transition: Hybrid forms, property rights, and mixed economy in Chin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7 (1), 1 – 27.
- [16] North, D. 1990. *Institutions,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7] Oyserman, D., Coon, H. M., & Kemmelmeier, M. 2002.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 – analys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 3 – 72.
- [18] Przeworski, A., & Teune, H. 1970.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Wiley.
- [19] Shenkar, O. 1981. *The Confucian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bureaucracy*.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 [20] Shenkar, O., & Ronen, S. 1987. The structure and importance of work goals among manag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0 (3), 564 – 576.
- [21] Shenkar, O., & von Glinow, M. A. 1994. Paradoxes of organiz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Using the case of China to illustrate national contingency. *Management Science*, 40 (1), 56 – 71.
- [22] Thomas, A. S., Shenkar, O., & Clarke, L. 1994. The globalization of our mental maps: Evaluating the geographic scope of JIBS coverag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675 – 686.
- [23] Treiman, D. J. 1977.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